



# 吸引6亿人次的革命纪念馆，如何“圈粉”年轻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一件皮箱，诉说着一位青年从浙江到延安的跋涉与理想；一幅名为《怒吼吧，中国》的版画，刻录下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革命纪念馆，与革命文物对话。

国庆中秋假期，在北京，30余组家庭在假期首日走进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北大红楼馆区，开启“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学活动；在延安，19座革命类博物馆纪念馆星罗棋布，各地游客参观红色地标，领略革命老区新貌。

此前，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孙德立介绍，全国年均举办革命、建设、改革主题展览超过3000个，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馆。471个革命遗址、纪念馆被列入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6个省级行政区发布95条革命文物主题游径。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青少年与革命文物亲密接触，深情回望历史，感受伟大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孙德立说。

## 不仅说“文物有多珍贵”，还要讲“青年有多勇敢”

孙德立表示，“十四五”以来，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在已有基础上取得长足进展，呈现新的面貌。革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全国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

摸清了文物家底，如何讲好文物故事？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是一个中小型革命纪念馆，该馆党支部书记、副馆长王欢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纪念馆以《我要去延安》主题展览为“试验田”，尝试打造一个抗战文物的“青春态”叙事。

为什么要为抗战文物注入“青春态”？“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无论从历史渊源还是馆藏资源，都与青年有着深度链接。特别是抗战时期，两万多名爱国青年，通过这里奔赴延安。这里跃动着许多鲜活的故事，沉淀着火热的抗战精神。我们有责任链接当代，面向未来。”王欢说。

展览在策划之初，纪念馆就对18—35岁观众进行了抽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62%的人认为“抗战精神与当代生活有距离”，77%的人表示“文物背后的故事比文物本身更动人”。

“这些重要数据让我们发现，多以‘事件史’‘宏观叙事’为主的传统展览，可能会遮蔽青年的个体选择与情感体验。革命文物要‘活’起来，必须打破‘代际温差’；抗战精神要‘传’下去，必须找到与青年的‘情感接口’。”王欢说。

为此，该馆在对馆藏资源作了再次梳理和深度研究后，开展了有针对性的走访和征集，并最终将答案锁定在文物——尤其是那些自带情感温度的“青春物件”。“我们换了个视角，不仅说‘延安有多伟大’，还要讲‘青年有多勇敢’；不仅说‘文物有多珍贵’，还要讲‘背后的故事有多鲜活’。”王欢说。

比如，西安美术学院原院长刘蒙天奔赴延安时携带的皮箱，之前展出，是放一个说明牌；现在，以皮箱为核心，通过时空串联地理，来讲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他怎么从浙江家乡启程，遭遇途中路费被偷等磨难，仍然坚持理想，徒步抵达延安。

《我要去延安》主题展览还把舞台交给年轻人：联合高校和学生深度参与文物保护、策展设计等工作；共同策划表演“我要去延安”实景剧；开展学校巡展巡讲，参加“新时代青年延安行”，鼓励他们创作主题Vlog……

王欢透露，该展览开幕一年多来，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75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136%，其中18—35岁群体占比达65%。巡展还走进新疆、内蒙古等地博物馆，和北石油、北科大、火箭军工程大学等40多所高校。

王欢在观众留言本上看到这样一条留言：“原来‘坚定理想信念’不是口号，是纺车转一圈、信纸翻一



“我要去延安”实景剧。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供图



2024年3月26日，香港林大辉中学师生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复兴一课”。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供图



周恩来1944年从重庆带回延安的意大利小提琴。

延安革命纪念馆供图



《怒吼吧，中国——北京鲁迅博物馆藏抗战版画(1931—1945)》海报。

北京鲁迅博物馆供图



华侨青年王唯真的抗战手绘本。

延安革命纪念馆供图

页，补丁打一摞攒起来的。”

## 纪念馆成为大课堂

“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当文物为青年讲好抗战故事，革命纪念馆本身就是绝佳的课堂。

截至目前，全国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以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香山革命纪念馆、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革命场馆建成开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改扩建工程竣工开馆，革命纪念馆建设质量和展陈水平显著提升。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立在南京大屠杀江东门集体屠杀遗址之上，于1985年8月15日建成开放。从2014年起，这里成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举办地。

纪念馆内设有基本陈列《南京大屠杀史实展》、主题展览《正义必胜 和平必胜 人民必胜——中国战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审判日本战犯史实展》、“慰安妇”受害者专题陈列《二战中的性奴隶——日军“慰安妇”制度及其罪行展》等。

该馆副馆长时鹏程介绍，纪念馆着力打造“六个一课”，讲好国家公祭仪式举办地的“大思政课”。所谓“六个一课”，即入伍一课、从教一课、行前一课、复兴一课、归国一课、入职一课。每一课都为特定的授课对象，从不同的切入口“定制”内容。入伍、从教、入职是按职业划分；行前、复兴、归国，则指向特定群体。

“行前一课，面向南京普通高中和职业学校即将出国的学生，教育他们出国后做爱国主义的践行者、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和平种子的传播者。从2017年至今，已经有9000多人上了这节课。”时鹏程说，复兴一课，则面向港澳台同胞，引导他们深化民族记忆，增强国家认同；归国一课，面向留学归国人员，激励他们心系“国家事”，肩扛“国家责”。

在时鹏程看来，纪念馆讲授思政课，首先依托于文物史料和纪念设施，以文物为“教材”、以场馆为“教室”、以遗址为“课堂”，中山码头集体屠杀遗址出土的遇难者遗物、日军在南京常府街慰安所的留言墙、约翰·马吉拍摄的影像胶片……搭建起最好的课堂。

9月5日，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和香港培侨中学，以及澳门濠江中学、东南学校近70名学生，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澳门濠江中学学生陈韶君曾通过历史课了解南京大屠杀历史，此次实地探访让她有了更深刻的体会，“纪念馆里的文物、幸存者的真实经历等史料，铁证如山。如今祖国繁荣昌盛，与过去积贫积弱的面貌截然不同，我们更要珍惜”。

师生们还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夏媛面对面交流，夏媛的外婆夏淑琴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香港培侨中学教师谭小铭已是第三次走进纪念馆：“这次听到幸存者后代讲述，学生们把课本上的文字知识与实地看到的文物、听到的故事结合起来，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历史，也更清晰地认识祖国从苦难走向繁荣的历程。”

## 从文物看到历史的现场

《怒吼吧，中国——北京鲁迅博物馆藏抗战版画展(1931—1945)》，于8月末在北京开幕，精选馆藏132幅抗战时期木刻作品、13种版画图书刊物及3封画家信札，系统呈现“捏刀向木、直刻下去”这一朴素艺术形式所迸发的强大生命力。

版画这门技艺其始自中国，古称“绣梓”；在14世纪随丝绸之路传入欧洲，逐渐发展出画家自绘、自刻、自印的创作版画；到了20世纪30年代，鲁迅发现，这种形式特别适合现代中国。成本低——一块板子、一把刻刀，随时随地可以创作，而且容易复制、传播得快。于是，经鲁迅大力引介，创作版画重回故土。

1931年8月17日，鲁迅在上海发起了为期6天的木刻讲习会，鼓励青年艺术家既要吸收外来技法，更要表现“中国向来的魂灵”。然而，历史的转折猝不及防，讲习会结束不到一个月，九一八事变爆发，艺术家立即行动起来，日夜赶制抗日日报与木刻传单，张贴于街头巷尾，践行了鲁迅所言“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

为什么展览叫“怒吼吧，中国”？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姜亚新介绍，这源于李桦创作于1935年的经典作品，这件作品塑造了一个被缚的、仰天怒吼的巨人形象——蒙目的布条遮不住沸腾的血性，半跪的身躯如盘桓的山岳，粗绳深陷皮肉却勒不垮挺直的脊梁。

“今年，我们依然能从这些版画中，感受到年轻艺术家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一刀一刀刻下的民族苦难与不屈脊梁。它们不只是展品，更是一代人的生命印记、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姜亚新说。

8月末，专题展览《改变世界的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视域的中国抗战》，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与延安革命纪念馆两地，同时面向公众开放。

“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也是一场文化的战争。展览中，《黄河大合唱》等经典文艺作品组织起千军万马的抗战故事，通过展示、讲述与情景互动，关联一体，使展览可观、可讲，与观众产生情理共鸣。”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

刘妮从事文物工作34年，迄今已征集文物上万件：冼星海的音乐指挥棒，用15年迎回延安；周恩来1944年从重庆带回延安的意大利小提琴，耗时10余年回到延安；今年，华侨青年王唯真的抗战手绘本，则是用22年征回延安的珍贵抗战故事……

“我的体会是，文物征集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不是一时的发力，而是长期对文物背后研究和阐释的漫长过程。所谓心用到、情至深、力竭尽，方可让文物回到历史的发生地，讲好历史的故事。”刘妮说。



2025北京文化论坛“剧力无限——剧集精品创作与产业升级新视野”沙龙现场。

主办方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对于创作者而言，一切都应该回到创作者的自觉与自省。我们不仅要讨论作品如何对话流量时代，更要讨论创作者如何与自己对话。”日前，在2025北京文化论坛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编剧梁振华说。

“我们无法逆转河流，但可以选择做一朵什么样的浪花。”梁振华相信，无论何时，手艺永远是制胜的法宝，创作者的本职是咀嚼生活、深掘人性、凝视时代。

今年北京文化论坛期间，多位影视行业从业者不谋而合，探讨剧集的发展新路径，勾勒出“破圈”与“深耕”并行的中国影视发展新图景。

##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在北京文化论坛上亮相的《山花烂漫时》《生万物》《归队》等长剧主创，恰恰告诉观众：艺术品质和流量热度可以达成“完美结合”，深刻题材亦能赢得

#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影视“审美提纯”造就爆款

年轻观众的青睐。

《山花烂漫时》编剧袁子弹在塑造张桂梅校长这个人物时，摒弃“苦难叙事”，着重展现主角作为理想主义者的“高级快乐”，展现张校长“创业”的艰难与热血的同时，也写出她的幽默鲜活性格。同时，这部剧展开了一幅相对广阔的“当代中国中小城市真实的生活画卷”。

袁子弹提出，长剧不能一味求快，它应该像长篇小说，要有宏大的世界观、严密的逻辑、强大的人物魅力等，并且更要承载文化价值，让观众从作品中产生文化认同。

袁子弹形容，这些都是长剧的“余味”。

最近热播的乡土题材剧集《生万物》，创造2025年央视八套平均收视和单日最高收视的双冠佳绩，打破近3年收视纪录。这部剧“以小家讲大家”，通过“把日子过出花”的精神内核，展现人和土地的连接，以及个体的生命力。

爱奇艺高级副总裁、《生万物》总制片人戴莹提到，看后台的“用户画像”，25—35岁用户占比达54%，说明这部作品深度影响了年轻人进场观看。

戴莹说，《生万物》和《山花烂漫时》不谋而合的一点是：哪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苦难和困境，而剧集主创希望描绘单一个体“努力生活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并传递给观众。

土地是中国人的根，孕育着生命，是中国人对家庭情感的依托。《生万物》中，竹筒中的羽毛随春气飞腾，家家户户甬谷仓时高喊着“五谷丰登，粮食满囤”，这些民俗场景引发观众热议；剧中的“扎宽汉”（打零工者）成了流行词，引发年轻人的共情。

戴莹发现，年轻人并非只爱看快餐式内容，他们

很渴望从剧集中获取文化价值、知识点与情感共鸣。她感慨，这部剧的好成绩证实了“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作品能够有很好的反馈”。

## 创新表达，审美提纯

梁振华说，他每次听到有人谈要“对标”某个爆款的时候，会觉得很刺耳。“‘对标’谁，就意味着先天臣服于谁，就意味着给谁的余唾。走别人的路，只能算创作上的穷途末路。”

跳出“套路”，追求创新，是影视作品“破圈”、打动观众的关键。

最近播出的电视剧《归队》聚焦大时代下的小人物，在全民抗战的特殊时代里，被战火阴云笼罩的东北大地上，一群在生存线苦苦挣扎的普通抗联战士，历经艰难坎坷，却始终信念如一，奋起反抗坚持归队。

“《归队》没有把镜头对准丰碑，而是对准基石，对准了一些在14年抗战的过程中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的普通战士。”北京文化论坛期间，《归队》主演胡军说，自己之所以偏爱剧中“老山东”，是因为这个角色“表面的不完美反衬了其内心坚持的可贵”。

《归队》导演臧溪川在分享如何运用当代视听手段还原历史精神时表示，这部剧没有讲有名的战役、先烈，而是讲述一群普普通通的小人物，也是一种创新。

“现实主义创作是要真诚地面对观众，用自己最真挚的表达方式跟他们交流，把一颗最真诚的心交给观众。除了真诚外，你作为创作者对于人物、细节的真实表达也是很重要的。”臧溪川说。

今年获得高口碑的《以法之名》，首度聚焦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讲述了“海东省”检察机关在省委政法委、省检察院领导下，高质效办司法工作相关人员职务犯罪案件、打掉政法系统内部“保护伞”，维护公平正义、护航社会发展的故事。

《以法之名》总制片人高金玺提到，这部剧的创作遵循了4个原则：一是鲜明的人物性格，二是复杂的人物关系，三是完成人物的“情感建设”，四是讲述一个不复杂的故事。

“如何完成故事、人物、主题和观众的连接？有一个最主要的通道就是情感的共鸣，你让他（她）感同身受，他（她）就愿意看你的故事。”高金玺说。

李潇作为《玫瑰的故事》编剧，谈及IP改编时提到，她将原著中黄玫瑰是折射每个男生感情观念的镜子这一设定，转为讲述女性的成长故事。

李潇把亦舒自己的生平故事，以及亦舒其他小说的灵魂都放到了黄玫瑰身上。“如果没有亦舒这部作品的灵魂内核，就没有剧集《玫瑰的故事》所谓的创新。”

在梁振华看来，审美创造和流量可称得上是“貌离神合”的一对兄弟：一个输出创新原动力，一个提供时代扩散力。观众可以看到，很多被称为“爆款”的作品，其实是审美和流量的结合体；它们表面上顺应了流量逻辑，究其其实质，是凭借自身新异、独特的艺术魅力完成了突围。

梁振华认为，艺术创作的核心生命力在于求新求异地创造。在他看来，创作的最大法门是“审美提纯”——把创作的初始冲动保留下来，把差异化的部分放大，把新奇的感受传递出来；用与众不同的美学表达，达成流量时代的吸睛功能。

## 文化批评

□ 于大雷

近年来，随着思想政治教育与美育的深度融合，红色题材已成为校园艺术创作的重要主题。每逢重大纪念节点，各校纷纷以文艺演出为载体，用青春的声音讲述信仰的故事。这一趋势可喜可贺，但也必须清醒看到：一些作品主题虽宏大、形式也热闹，却因“质感”不足而难以抵达人心。

所谓“质感”，不是装饰性的光鲜，而是内容、技艺与精神的内在统一，是历经对历史、审美与专业三重检验的真功夫、真情感、真思想。

回望一些大型庆典与文艺活动，我们之所以感到震撼，并非只因舞台绚烂，更在于对历史的敬畏与对技艺的千锤百炼。例如，前不久的九三阅兵以及当晚《正义必胜》文艺晚会，之所以能引发广泛共鸣，根本在于参与者以“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自觉，将精神内核化作精准的步伐、饱满的音色和凝练的身体语言，把爱国之情、强国之志落实到一个个可感可触的细节之中。这种细节之严谨、情感之真挚、表达之克制，合起来就是“质感”。

然而，在一些文艺作品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也不容回避：教化道粗疏、布景起皱、走位失衡，暴露出对细节的忽视；合唱跑调、动作僵硬、台词空洞，反映出专业训练的不足；有的作品停留在堆砌符号与复述史实，未能深入历史逻辑与情感脉络，导致“有主题而无灵魂”。

想要“提升质感”，必须在“思想-技艺-叙事-机制”四个层面同步用力。

第一，把思想教育与专业训练打通。技术是艺术的筋骨，思想是艺术的灵魂，二者缺一不可。要用读本、观影、研学等方式，把革命历史的来龙去脉、人物的情感线索讲深讲透；同时建立“课程-排练-演出-评估”的闭环，把声乐的音准与呼吸、舞蹈的重心与线条、戏剧的节奏与分场，落到每一次组合、每一段咏叹、每一次走位。让学生明白：每一个抬手、每一次换气，背后都承担着叙事与情感的指向。

第二，用“细节清单”推动全过程打磨。制定量化的质量标准：音准节拍是否稳定、句法换气是否合理，身体能量是否贯通，群舞队形是否清晰，教化道是否与年代、地域、人物一致，舞台空间是否留白得当。建立“首演前十问”与“复盘三表”（问题清单、改进方案、责任到人），把反复打磨固化为常态。

第三，叙事上“小切口讲大主题、真情感担大道义”。要在真实、鲜活、可共情的情境中展开表达，避免空喊口号、堆砌符号。可以用一个家庭的离合、一段通信的往来、一处地标的变迁，勾连家国命运、时代洪流，让观众在细微处见宏大、在平实处见崇高。

第四，形式上守正创新、弘雅避俗。在尊重艺术规律的前提下，探索戏剧、音乐剧、舞蹈诗、合唱与朗诵的跨媒介融合，适度运用影像、多媒体与数字技术，增强叙事的空间感与层次感。同时警惕“短视频化”带来的快餐审美，坚决不以噱头取代内容、不以炫技掩盖真情。

实践证明，只要思想与技艺同频、细节与情感同向，校园也能创作出具有专业水准与时代温度的红色佳作。近期，在全国第八届中国小学生艺术展演中获得舞蹈类一等奖的《共潮生》就是范例。该作品以“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为意象，把海洋的浩瀚与血脉的绵延有机结合。

编导以群舞勾勒潮汐的起伏，以队形的流动组织叙事节奏，地面翻滚与腾跃象征暗流与波峰，被风道具在手中与空中转换，既是温煦的乡音，又是翻涌的浪花。一对隔海相望的兄弟成为情感支点，肢体语言在克制中饱满，既写分离之痛，又写牵挂之深。高潮处红色国巾的递相，象征血脉相连、命运与共；《我的中国心》旋律的进入，不是喧宾夺主的铺陈，而是水到渠成的情感催化。作品以“海”为喻，以“情”为核，以“技”为笔，做到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统一，显出校园创作完全可以专业能力致敬崇高理想。

为把“质感”落到日常，还需完善体制机制。其一，构建“工作坊-小创-大戏”的梯度孵化链，让学生在不断试错与改进中成长；其二，完善“导师制+同行评议+社会观众测评”的多元评价，既看专业也看传播，既评技术也评价值；其三，建立资源共建共享机制，推动大中小学与地方文艺院团、博物馆、党史馆等单位共建实践基地，让课堂延伸到社会大课堂；其四，健全“文化与治理”规范，尊重历史事实、尊重人民形象，反对庸俗化、娱乐化。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真正的“质感”，从来不是“情怀”替代“功力”。红色题材关系信仰与价值，更需要扎实的基本功来托举。唱要准、说要清、跳要稳、演要真；一字一句、一招一式都须经得起“专业的挑剔眼”和“群众的真眼泪”。只有把敬畏之心、求是之心、匠人之心融为一体，才能把红色题材写活、演实、唱响。

校园红色艺术创作肩负着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的使命。摒弃形式主义，回到艺术规律；坚持价值引领，坚守专业标准；在“思想的高度”与“技艺的厚度”上同时加码，把“质感”贯穿选题、打磨、呈现、传播的每一个环节，红色作品才能真正走进学生心灵，化作向上向善的内在力量。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教师）

创演红色作品，情怀不能替代质感